

嵩山文明论

赵保佑 张新斌

摘要: 据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以“天地之中”的中岳嵩山为中心的中原核心区文明即是嵩山文明。该文明是依托“圣山”的文明,是山与水相结合的文明,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文明,也是历史时期大古都环绕的主干文明。嵩山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十分清晰,在早期文明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嵩山文明是中华文明“重瓣花朵”中的“花心”,铸牢了中华文明大一统国家政体的根基,铸就了中华文明的魂脉与基因基础,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历史地位。深化嵩山文明的研究,对于科学认识中华文明起源演进的历史规律,增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中的文明自信,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嵩山文明;中原核心区;中华文明

中图分类号: K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2-0135-08

嵩山地区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主源。经过考古学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持续地探索,嵩山地区的历史在中国早期文明发展中形成的考古文化序列愈加清晰,其连续不断的历史脉络也得到较为完整充分的实证,有必要正式提出“嵩山文明”这一概念,并利用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梳理嵩山文明的发展轨迹,论定其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演进中的历史地位。

一、关于嵩山文明概念的含义与区域范围

学界关于“文明”的概念有多重含义,经典的是恩格斯的观点,“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1],国家是人类社会告别“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如何判定文明社会?“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了中国方案。即“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这一阶段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出现

了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了阶级、王权和国家”。“‘文明形成’是指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都取得了显著进步的阶段。社会分化加剧,形成了阶级;社会等级制度化,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化,形成了礼制;出现了集军事指挥权与宗教祭祀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王,以及强制性的、以社会管理为主要职能的公共权力——国家。国家的出现是文明形成的标志。”^[2]

嵩山文明,就是以“天地之中”的中岳嵩山地区为中心的中原核心区文明。“天地之中”是中国古代具有哲学意蕴的思想观念。《周礼·大司徒》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3]这里讲的实际上是一个均衡,在这样一个地区达到了天地间的适合,四季间的交会,气候间的均会,阴阳间的平和,达到了多维立体空间的“中”的平衡。据研究,“天地之中”的说法,多以洛阳包括洛、洛地、洛师、洛邑、洛之邑、洛河之邑、洛水之涯、洛邑之地等为中心,实际勘测的地点就在嵩山。所以《太平

收稿日期:2024-04-08

作者简介:赵保佑,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河南郑州 451464)。张新斌,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河南郑州 451464)。

寰宇记》卷一百七十二上记载：“李淳风曰：‘今洛阳告成县以土圭测天地之中也。’然则四夷之所距，推此可知焉。”^[4]这里讲的就是今登封市告成镇的“周公测景台”。“天地之中”，刻意强调了思想观念上的特殊性，着重关注了本质文化的特质性，重点强化了政治统治的正当性^[5]，从而使嵩山在中国历史上成为具有神圣意义的文化名山，形成了在华夏核心区独有的以山水而命名的文明。

第一，嵩山文明是依托“圣山”的文明。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嵩山被称为“天室”，据当代学者邹衡、郑杰祥、蔡运章等研究，“天室”即指太室山，位于今河南省中岳嵩山^①。“天室”也就是天神居住之地，人与天沟通之地。《山海经·中山经》有所谓“少室、太室，皆冢也”的说法。王晖认为：“冢山也就是宗山，是部族先祖的葬地，也是一个部族祖宗所聚的圣地。”嵩山，早期称之为崇山、崇高山，“崇山就是冢山，其本义是先祖神的宗室、宗堂，亦即先祖神所群居的地方”^[6]。所以，嵩山在中华文明早期历史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这是其他名山所不具备的。

第二，嵩山文明是山与水相结合的文明系统。周昆叔在提出“嵩山文化圈”时强调：“嵩山文化圈的形成是山、水、土、生(生物)、气(气候)和位(地理位置)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7]以嵩山为代表的“相对独立的几千平方公里的中低山，有多条河流由该山发源”^[8]，这些水包括黄河、淮河、济水的支流，“可称之为三水文化，或称之为山河文化”^[9]。据文献记载，发源于嵩山的黄河水系支流，包括伊水、狂水、休水、八风溪水、江左川、罗水、湟水、青龙河、合水与刘水等。发源于嵩山的淮河水系支流，包括颍水、洧水、滎水、少阳河、双溪(洧)水、五渡水、平洛水等。发源于嵩山的济水水系支流，包括砾石溪水、索水、须水、京水等^{[10]66-78}。嵩山地区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理现象，在洛阳南部和西南部山区，有多条沟溪交汇的河流，汇入属于长江水系的汉水(如白河)，反映出由嵩山向四面八方走向的辐射水系。

第三，嵩山文明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文明。在嵩山周围发现有旧石器时代遗存超过300处、裴李岗文化遗址160多处、仰韶文化遗址300多处、河南龙山文化遗址400多处、夏代遗址近百处、商代遗址100多处。早期文化连续不断的特点，形成了中国史前文化总体上有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11]。这个中心就是以嵩山地区为标志的中原核心区，经历了“约公元前第六千纪初期的裴李岗

文化后期、公元前第四千纪初期的庙底沟类型早期和公元前第二千纪初期的王湾三期文化后期早段”的三个高峰时期。“在高峰时期，以嵩山文化圈为核心的中原腹地一般成为强势中心；在其强力作用下，中原文化内部的统一性明显增强，对外影响也显著增大。在酝酿和低谷时期，中原腹地的强势作用减弱，中原文化内部的统一性降低，外来影响则显著增强。高峰期中原文化的重要作用当然无可置疑，但过渡和低谷期的中原文化得以有机会博采众长、酝酿提高，其意义也不可小视。其实这两个阶段显然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正是在这种有吸有呼的辩证过程中，中原文化得以呈螺旋式发展壮大。”^[12]嵩山地区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仰韶文化的双槐树遗址所体现的文明成果，为广域王权王国政权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包容性、创新性的突出特点。

第四，嵩山文明是王朝时期大古都环绕的主干文明。《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毋远天室”，以效仿夏人“择中立国”的思路。他不但“王祀于天室”，在嵩山举行祭天活动，而且“余其宅兹中国”，将都城和政治中心放在嵩山附近^[13]。实际上，黄帝都有熊，夏朝第一都亦即“禹都阳城”，就在今嵩山南麓的登封境内。商代“汤都亳”，就是“郑州商城”，还有隰都在郑州的小双桥，晚商的殷墟就在安阳。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夏都主要在嵩山的南侧和西侧，商都主要在嵩山的东侧、北侧。周初所建的成周洛邑，仍选择在嵩山的西侧。北宋时的都城开封，则在嵩山的东侧。嵩山成为中国大古都东西轴线的核心。嵩山文明这种国都文化的特征，正是其以嵩山为标志可以称为文明的底气所在。

嵩山文明所涉及的区域，体现了文明演进“变与不变”的逻辑关系。“不变”，就是以嵩山地标为核心的周边不变区域；“变”，就是随着文明演进和历史时代发展的变迁，其周边外延地区会有所拓展和变化。

首先，以自然环境考察嵩山文明的区域范围。在研究嵩山文化圈时，周昆叔将其划分为中心区(核心区)、边缘区和影响区。其中，中心区包括嵩山山体、山麓、山前盆地、山前冲积扇、山前洪积扇、剥蚀堆积倾斜平原和剥蚀堆积平原。东接华北冲积，西接豫西谷地，北临黄河，南抵淮河^[8]。张新斌认为：“古代文献中所界定的‘嵩山之域’，实际上以郑州与洛阳之间的地区为主，这个地区可以称之为中心区，而登封作为嵩山主峰所在地，无疑应为中心

区中的核心区。至于北至黄河,西至洛阳市区,东至郑州市区,包括偃师、巩义、登封、荥阳、新密、新郑、伊川、汝州、郟县、襄城、禹州等县市,应属广义的嵩山地区。”^{[10]78}这一地区地理上处于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之交和中纬度与高纬度之交,气候上处于暖温带与北亚热带之交,是典型的生态过渡带,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成长,形成了时间上横跨十多万年成体系的人类活动遗迹以及连续不断的考古文化遗址,基本形成了早期文明发展的地理空间。

其次,以历代行政区划来考察嵩山文明的区域范围。秦代开始正式在全国推广郡县制度。秦代设置了三十六郡,其中有三川郡和颍川郡。三川郡共辖有 19 个县,包括:荥阳、京县、成皋、华阳、巩县(均在今郑州市辖区),洛阳、河南、谷城、平阴、缙氏、新城、宜阳县(均在今洛阳市辖区),陕县、浞池、新安、卢氏县(均在今三门峡市辖区),阳武、卷县(今新乡辖区),梁县(今平顶山辖区)。颍川郡共辖 14 县,有颍阳、阳城、新郑、苑陵(在今登封、新郑境内)等,在今许昌市辖区的有 6 县,在今平顶山市辖区的有 2 县,在今开封市辖区的有 1 县,在今驻马店市辖区的有 1 县。西汉时改三川郡为河南郡,先后属河南郡的县有:荥阳、中牟、巩县、故市、京县、索县、新郑、苑陵、成皋、密县(均在今郑州市辖区),洛阳、偃师、平阴、河南、缙氏、新成、谷城、宜阳、平县(均在今洛阳市辖区),梁县(今平顶山市辖区),阳武、原武、酸枣、卷县(均在今新乡市辖区),启封、陈留、尉氏、黄乡、圉县(均在今开封市辖区),卢氏、新安、陕县(均在今三门峡市辖区),另外还有岐、闲阳等县^[14]。

可见,西汉河南郡所涉及的范围比秦时的三川郡更大。东汉魏晋,逐渐在西设弘农郡(多属今三门峡市及洛阳西部)、东设荥阳郡(多属今郑州市)。秦汉时的大郡体制,可以看出嵩山两侧长期同在一个行政区域建制。

综合来看,由于嵩山的地势特征造就了水呈放射状,其流出的河流,分别流入古河水、淮水、济水、长江,是国内水网最为密布的地区之一。所以嵩山文明涉及的区域范围,涵盖今河南省大部分地区的广袤地理空间。涉及中心区大致包括今郑州、洛阳、三门峡、平顶山、开封、许昌、漯河、济源、焦作、新乡、鹤壁、安阳等,因时段不同向外有所延伸或收缩。其核心区就是嵩山腹地郑州和洛阳两市及周边相关县区。

二、嵩山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

1. 嵩山文明的奠基

以嵩山为中心,方圆约 200 千米,考古文化遗址达 160 多处,尤以距今 9000—7000 年前的新郑裴李岗遗址最为典型,肇始了一系列的文明萌芽。

裴李岗文化发现有大量石斧、石镰、石铲、石锄、石镰、石刀等生产工具,尤以锯齿型石镰、石磨盘棒最具代表性,还发现有人工培植的水稻和粟,表明其已由采集农业向种植农业转变,并已开始圈养猪、羊、牛、狗、鸡等家畜。从出土石器和陶器的规模数量和制造技术上看,氏族成员有了专门的分工。裴李岗文化的聚落,面积不大,人们多在临近河边的二级台地上建造椭圆形、圆形、圆角长方形和不规则形的单间、双间、三间房屋。聚落内房子布局有序,功能区分有别,设施已见雏形。聚落内有人工修筑的排水沟渠,聚落周边也有利用自然沟壑修建的防御式壕沟。显然,这些聚落的规划和建设是在一定组织下完成的。从出土石器和陶器的规模数量和制造技术上看,社会组织体系开始形成,氏族成员有了专门的分工^②。

贾湖、裴李岗、莪沟等遗址发现了骨针、纺轮、陶制蚕蛹等,说明纺织品已经出现,所发现陶器有烹煮类炊具鼎、甑、钵,盛放类炊具盆、瓮、缸,汲水类炊具壶、罐,餐具类器具碗、盘、杯、勺、铲等,尤其在贾湖遗址还发现了果酒类饮品,反映了人类的饮食结构更加丰富^③。绿松石饰件、玉石管件、石环饰品、陶制动物、陶塑人头像的发现,均反映当时审美情趣的提高与艺术水平的发展。贾湖遗址还出土了在龟甲上、陶器上、骨器上、石器上刻划的文字符号,经古文字专家考证,这些契刻符号与商代甲骨文惊人相似,学界多认为,贾湖契刻符号应该是一种文字,“贾湖刻符对汉字来源的关键性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资料”^[15]。贾湖遗址中出土骨笛 30 多支,已经具备七音阶甚至变化音级。贾湖骨笛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七千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在精神文化方面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表明中原地区的原始文化在当时与周围地区相比是居于领先地位的。”^[16]

裴李岗文化的墓葬都遵从一个方向,墓圪为长方形土坑,葬式一般为单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一般 3—5 件,最多的超过 20 件。承担农业生产和狩猎

活动的男性墓葬,随葬品多为石铲、石镰、石斧、箭镞等生产工具;从事家务和采集活动的女性墓葬,随葬品多为石磨盘、石磨棒等谷物加工器具,极个别的墓葬还随葬有饰品和艺术品^④。裴李岗文化的葬俗从布局、墓圻到随葬品都形成了基本制度,是“强调社会秩序的反映”^[17]³⁰。

裴李岗文化在土木营造、聚落组织、农业发展、制造纺织、文字音乐、审美礼制等方面进行了创造,一系列知识体系开始形成,“将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前到距今8000年以前”^[17]³⁵,肇始了文明的基本元素,完成了嵩山文明的奠基。

2. 嵩山文明的形成

在荥阳青台遗址发现了5500年前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质地轻薄稀疏,丝缕纤细,已有纱和罗两个品种,且均已染色,而罗的织作技术复杂,织物染色工艺高超,可见丝绸织造工艺技术已非常成熟。青台遗址还发现了麻纱、麻绳、麻布残片等麻织品,出土大量纺轮、骨针、骨匕、陶刀等纺织工具^[18]。在荥阳汪沟遗址也发现了5000年前的丝绸遗存;在巩义双槐树遗址还发现骨雕蚕及与丝绸有关的遗存^[19],反映出在5000多年前当地先民已普遍掌握了纺织技术,他们植桑养蚕,取蚕丝巧织经纬,农桑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经济和重要特征。灵宝铸鼎塬遗址群所在地,不但发现了大型中心性聚落,还有特大型公共建筑基址、特大型墓葬及人工开采的铜矿石^[20]。同时期的仰韶文化姜寨遗址中发现了铜器残片^[21],系由黄铜固态还原工艺制成,是中国最早的人工冶炼合金。距今6000年前,人们通过多年观察已经对天体运行有了基本认识。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龙虎图摆出了天体的意象,“龙虎和北斗,共同组成了一幅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星象图”^[22]。距今5300年前后,嵩山地区开始构筑城池,出现了西山、点军台、龙山岗、大河村、水牛张、后岗、郝家台、戚城等城址,其中的郑州西山城是迄今为止长江以北发现的最早城址。西山城由外环壕、内环壕、城墙三道防御设施组成,平面呈圆形布局,面积在20万平方米以上。城墙筑造中,不仅已经使用夹板、穿棍和立柱等当时最先进的方块版筑法,而且精心设计了防御设施^[23]。以西山城为标志,中国城市建设登上历史舞台。巩义双槐树遗址首次出现了高台建筑,出现了中轴对称建筑,出现了“前朝后寝”式布局,出现了主要殿堂下的北斗九星等天文遗迹,一改此前公共建筑环形布局、不居高临下的形式,彰显了权力的至尊无上,肇始了后世王

国、帝国时代宫城和宫殿建筑的基本格局^⑤。所有这些表明,社会权力机构已经出现,维护权威的“承天而治”理念、尊卑有序的礼制建筑等已经形成,原始国家文明开始登上人类社会舞台^[24]。“双槐树大型围沟聚落,特别是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的发现表明,距今5300年前,中原地区的社会分化较之于距今5800到5500年期间铸鼎塬遗址群所看到的状况更加严重。因之,李伯谦最先将这一阶段的黄河中游地区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中心聚落称为‘河洛古国’。”^[25]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社会开始出现不平等现象,普通聚落与中心聚落构造悬殊明显,中心聚落规模宏大,建有防御设施的城池或环壕,形成了林立之势,城址群的出现说明等级和阶级关系的产生。单体聚落内部的等级化、分层化也十分明显,高规格建筑出现,部落内部的贵族阶层开始出现,贫富分化比较明显,非正常死亡大量出现。嵩山地区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独有的发展模式:以“天人合一”为原则,注重社会与环境的和谐;以“祖先崇拜”为手段,注重血缘关系的架构;以王权为核心,注重人类社会发展;以礼乐文明为规矩,突出社会秩序的稳定。形成了尊贵轻富、尚朴重礼、倾力民生、注重家国的社会时尚,种下了中华文明“轻宗教而重民生”的基因。因此,生产力进步、社会分化、古代王城的出现,表明嵩山文明已经形成。

3. 嵩山文明的辉煌

距今4500年前,曾经辉煌无比的红山、良渚、海岱、甘青、屈家岭等文化,都没能再向更高层次发展、向更广阔范围推进,而他们遗留下来的文明成就却在嵩山地区汇聚、碰撞后开始蝶变。嵩山地区开放包容的胸怀最大限度地吸收接纳了各个文明中的精华,一个以嵩山地区为中心的广域政治、文化共同体逐渐形成。

距今4000多年前,融汇了各地先进文化因素、具有强大号召力的夏王朝在嵩山地区正式建立,开始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在环嵩山周边,考古工作者先后发现了4000年前至3600年前的王城岗、瓦店、新砦、二里头等遗址,被认为是夏王朝从建立到灭亡的都城遗址^[26]。特别是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已经不再是初级形态的文明了”,“二里头的一些特征产品如牙璋、玉刀、绿松石镶嵌青铜牌饰、陶封口盂等对外有广泛传播。这些并非普通生活用器,而是礼仪制度用器。所以,它们传播至四极八荒,实为中原社会的政治礼仪、制度、思想

的播散。二里头文化立足中原,却辐射四方,不仅再一次改变了中国文明进程的格局,还开启了以中原为主导的、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华文明遂进入新的阶段——“王朝时代”^[25]。距今3600年前,商王朝推翻夏王朝先后在嵩山东北部的郑州、安阳等地建都,将文明发展推向新的辉煌。商王朝形成了立体权力体系,建立了宗法制度,文字已经成熟,典章已经出现,中国古代文明制度在商朝基本成型。公元前11世纪,推翻了商王朝的周王朝,为使政治中心居于“天地之中”,而在嵩山西北建立了新都洛邑,不但放置有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也驻有称为“八师”的军队。西周王朝在殷商文明的基础上,弱化神治,强化礼制,形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又一座高峰。周朝实行分封制,封国几乎遍布中国核心地区。东周时期,洛阳成为正式都城后发展为全国知名的文化之都与商业之都。

夏商周三代,以嵩山文明为基础,形成了中华文明政治、经济、文化等核心内涵,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风格和价值取向,夏、商、周、汉、晋、北魏、隋、唐、北宋等在嵩山地区有3000多年建都史,有汉武帝、魏孝文帝、武则天等帝王73人次登临嵩山祭祀封禅,嵩山地区的政治地位和历史地位是其他名山所不具备的。所以,嵩山文明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谱写了连续不断的历史华章,始终是中华“一体”的核心主干,成为中华文明辉煌发达的代表。

三、嵩山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历史地位

1. 嵩山文明是中华文明“重瓣花朵”的“花心”“花蕊”

中原文化区的概念系严文明首先使用。他在研究中国文明的多元发展格局后,对中原文化区在中华文明中的位置做出形象描述和定性判断。“这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11]嵩山文明即是以“天地之中”的中岳嵩山为中心的中原核心区文明。严文明的观点是对中原文化区原生文明作用的论定,也是对嵩山文明地位作用的肯定。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结论证实:“重瓣花朵”的“花心”是具有丰富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内涵的;“重瓣花朵式”格局中中原文化是“花心”,“重瓣”是指中原周围有相互联系和影响的文

化圈。周边地区环绕中原,形成“重瓣花朵”的格局,中原地区不仅是地理上的“花心”,也是文化发展的引领者。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跌宕起伏的波浪式演进历程中,虽然受到来自东西南北各种文明的不断碰撞和冲击,其“花心”位置持久保持,不曾被撼动与替代。

作为“花心”,嵩山地区周边的文化在辉煌后进入沉寂衰落阶段。红山文化之后的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已经失去了红山文化的光辉。良渚文化之后的马桥文化和湖熟文化,时代虽然前后相接,文化面貌却缺乏承袭关系。马桥文化、湖熟文化遗址的分布密度、居址面积乃至文化本身的生产、生活水平,又都远低于良渚文化。湖北的石家庄文化最初也是一片灿烂,但由于神权支配一切,人为环境破坏造成了生态危机,进而引发政治危机。山东龙山文化从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王权高于神权,可谓勃勃生机。距今4000多年前,黄河、长江、淮河、海河等流域出现降温 and 延续多年的特大洪水,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一带灾情严重,山东龙山文化和江浙良渚文化发展一度中止^⑥。中原地区虽然也受到很大影响,但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对此变化却不大敏感”^[27],因此其文化更发达,社会复杂化程度更高,社会发展速度更快。

二里头文化作为早期中国文明的“花心”,其中心地位更是无可替代。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的考古学发现以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结论证实,司马迁“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确为信史。夏商王朝是处于“天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位。西周王朝中国的政治中心虽然有短暂的西移,但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又很快回归“天地之中”,此后,中原嵩山地区的“花心”地位便十分稳固且长期延续。

2. 嵩山文明筑牢了中华文明“大一统”国家政体的根基

“大一统”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个主要特点,也是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模式的一个突出特色,与王权统治、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措施等密切相关且影响深远。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是在华夏民族自然融合基础上自然形成的。五帝时代,嵩山地区以黄帝及其家族后裔为核心的融合,形成对本族裔部落和其他部落的“一统”局面。后夏禹把不同的部族分封到九州不同地区,并要求诸侯“祗台德先,不距朕行”^[28],“大一统”思想由此孕育起来,中华民族延

绵数千年而不绝的家国情怀便开启了源头。

夏、商两代的嫡长子继承制确定了宗族内核心者的身份,大小宗制明确了阶层之间的关系,从而使社会治理模式成为一种稳定的秩序。西周时期施行分封制,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天下政治形成了统一制度,正所谓“六合同风,九州共贯”^[29]。三代的政治实践证明,中国“大一统”政体雏形初现。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中国,不仅开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程,还实现了国家在思想、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一统,不仅疆域统一,而且“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30]。

“大一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政治理念,是中华文明5000年绵延不绝的支撑所在,是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精神所系。

3. 嵩山文明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

历史上的嵩山地区长期居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位置,也是不同部族融汇的大熔炉,中国历史上的若干次民族大融合,最重要的两次是在嵩山地区进行的。第一次从夏商周开始,经春秋战国到秦汉,以嵩山地区为中心的华夏部族后裔与古羌、夷、苗蛮、巴蜀、百越、西南夷融合为汉族。秦汉大一统的政治、经济形势,改变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民族分散的状态,西汉宣帝时,汉族正式形成。

第二次发生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北方的匈奴、鲜卑、羯、羌、氐等游牧民族开始大规模与中原地区各民族融合,他们不断吸收融合汉族的文化习俗,为了更大规模的大一统创造了条件,同时大量的汉族人迁徙到了东南地区,加速了与百越民族的融合。隋唐时期政治统一,嵩山地区的经济实力更加强,文化更加繁荣,高度的文明增强了周边各族的向心力,全国各族各地区间政治联系紧密,经济文化交流密切,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格局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越以前。因此,从“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份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疆域内部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形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31]。

4. 嵩山文明铸就了中华文明的魂脉与基因

文字是文明的核心要素,是一切文化的基础,也

是嵩山文明的独特贡献。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骨器和石器上,就有一些近似于文字字形的契刻符号^[32]。据研究,商代甲骨、金文中有一批象形文字,“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已开始出现,并以类似于‘活化石’的形式保留在商代文字中”^[33]。郑州二里冈遗址出土一段牛肋骨,上刻有3行10字。郑州小双桥祭祀坑中发现的小型陶缸表面或内壁有朱书文字,其文字内容可分为数目字、徽记类和祭祀短语类^[34],其陶文与殷墟甲骨文对比,可以看出二者存在明显的承继关系。人类四大文明中,其他文明的文字都早已泯灭不识,中华文明多元文化发展中,遗址中也发现有类似原创文字的刻画符号,但只有嵩山文明在演进中产生的文字系统延续下来,构成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华传统学术的重要研习对象,助推了中华文明的传承赓续^[35]。

“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传说上古时期伏羲氏时有龙马背负“河图”出于洛阳孟津,大禹时又有神龟驮“洛书”现于洛河。伏羲因“河图”而演八卦,大禹依“洛书”而定九州。“河图洛书”这两幅神秘的图案,凝结了嵩山地区古代人民的超凡智慧,被视为嵩山文明河洛文化的滥觞。《周易》是诞生于嵩山地区、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一部经典,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华夏先民思想、智慧的结晶。“河图洛书”是儒家经典《易》的来源,也是儒家学派的根本,延伸儒家的哲学基础。东周时期出现了诸子崛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儒、道、法、墨、阴阳、名、纵横等各家思想在嵩山地区激烈碰撞,相互吸引,展示出各学派文化势力的消长,极大地繁荣了中原区域的思想文化。

思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魂脉所在。儒家思想的哲学积淀来源于中原的“河图洛书”,礼乐思想源于周公在洛阳创制的周礼。孔子带领他的弟子在嵩山地区周游14年,儒家思想在中原大地上形成并广泛传播,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原文化中最有影响力的“显学”。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典和其思想形态在中原封建王朝的政治文明构建中付诸实践,儒学思想成为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制度稳定和权力合法性的理论依据。北宋时,程颐、程颢以儒学为核心,充分吸收了佛家和道家的思想精华创立洛学,在嵩阳书院讲学,使洛学得到快速传播。洛学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础,后经朱熹发展到极致,程朱理学成为此后最有影响力的、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系统。

文化原典和历史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念是华夏民

族智慧的精华,是根性文化的一部分。中华元典文化中《诗》《书》《老子》《庄子》《墨子》等,多发源于嵩山地区。佛学传入中国最早在嵩山地区生根,在少林寺产生顿悟成佛的禅宗;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在嵩山地区完成改革,使嵩山地区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策源地。中华文化中敬天法祖、道法自然的历史观,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宇宙观,以人为本、自强不息的世界观,有容乃大、义利统一的价值观,尚中求和、和合共荣的发展观,无不与创生于“天地之中”的诸子思想相关联。

由“河图洛书”所形成的系统整合思维方法,视天人为一体。由此形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和合共生”的价值观,以及强调和谐、理性、永续发展的制度体系。嵩山文明思想理论的核心是“天人合一”永续发展,这一核心是嵩山文明的价值追求,也成为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命题之价值传统。“天人合一”之道统与“大一统”之正统,根植于中华文明的系统整合思维和理论传统之中。嵩山“天地之中”的空间位置,使先民们在中国传统的五方观念中意识到“中”的重要性,使“居中而吉”“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文明理念逐渐形成。《论语·尧曰》云“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36],以地中为中心的“中域”“中土”“中国”“中原”政治地理概念,就显得十分重要。“居中而治”传统政治观确立之后,王都位置、王居位置便有所遵循,后又引申出“中正”“中庸”“中道”“中和”,使“中”具有了哲学的意义,“中和思想”成为中华文明系统整体思维传统中的理论瑰宝。

总而言之,嵩山文明是以“天地之中”中岳嵩山为中心的中原核心区文明,是依托“圣山”、以嵩山为标识、山水相结合的原生文明,其文明化进程形成了连续不断的考古文化序列:新密李家沟文化起源—新郑裴李岗文化奠基—仰韶文化确立—夏商周王国文明—统一秦汉唐宋帝国文明繁盛,文明的发展进程演绎了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城市出现、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阶级分化、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繁荣的全过程,显现出中华文明主源、历史发展主脉的核心地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深化嵩山文明的研究,对于深入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发展演进的历史规律,增进中华民族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文明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天室’一名在文献中最早见于《逸周书·度逸》”,“邹衡先生首

先认为应是指的太室山,即位于今河南省的中岳嵩山”,“蔡运章先生赞同邹、刘意见,具体指出《天亡簋》铭文记的‘天室’,就是指在今嵩山主峰太室山”。参见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20页;郑杰祥:《周初铜器铭文“王在阒师”与“王祀于天室”新探》,《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4期;蔡运章:《周初金文与武王定都洛邑——兼论武王伐纣的往返日程问题》,《中原文物》1987年第3期。②开封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2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张松林、信应君、胡亚毅、闫付海:《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05年第5期;郑杰祥:《新石器文化与夏代文明》,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蔡金英:《裴李岗文化:中国文明的奠基》,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③参见开封地区文管会:《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2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蔡金英:《裴李岗文化:中国文明的奠基》,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河南省博物馆、密县文化馆:《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5期;河南省博物馆、密县文化馆:《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编辑部:《考古学集刊》(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页;李绍连:《华夏文明之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阎铁成:《裴李岗文化——黄帝时代的开端》,《郑州日报》2024年4月7日。④参见开封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2期;开封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裴李岗遗址一九七八年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阎铁成:《裴李岗文化——黄帝时代的开端》,《郑州日报》2024年4月7日。⑤桂娟、双瑞:《河南巩义“河洛古国”重大考古成果发布》,《新华每日电讯》2020年5月7日;阎铁成:《双槐树遗址——古国时代的绝唱》,《郑州日报》2024年10月16日;王巍:《听首席专家讲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东方出版社2023年版。⑥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222页;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王青:《距今四千年前后环境灾变与洪水事件的新思考》,《中国文物报》2004年7月23日。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2.
- [2] 王巍.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主要成果及启示[J].求是,2022(14):45-52.
- [3] 杨天宇.周礼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50.
- [4] 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3293.
- [5] 张新斌.“天地之中”与“天下之中”初论[J].中州学刊,2018(4):120-125.
- [6] 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79.
- [7] 周昆叔.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嵩山文化圈[M]//周昆叔,齐岸青.中华文明与嵩山文明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7.
- [8] 周昆叔,宋豫秦,鲁鹏,等.再论嵩山文化圈[M]//周昆叔,齐岸青.中华文明与嵩山文明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29.
- [9] 周昆叔.地层·环境·嵩山文化圈[M]//周昆叔,齐岸青.中华文明与嵩山文明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25.
- [10] 张新斌.嵩山历史地理若干问题探论[M]//周昆叔,齐岸青.中

- 华文明与嵩山文明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 [11]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J].文物,1987(3):38-50.
- [12]韩建业,杨新改.嵩山文化圈在早期中国文化圈中的历史地位[M]//周昆叔,齐岸青.中华文明与嵩山文明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49.
- [13]张广智,等.大嵩山:华夏历史文明核心的文化解读[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8:176.
- [14]赵炳清,伍小琴,张祥云.河南行政区划史[M].郑州:大象出版社,2020:65-88.
- [15]孙展.河南发现世上最古老的文字?[J].中国新闻周刊,2021:40-41.
- [16]张居中.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和骨笛[J].华夏考古,1991(2):106-107.
- [17]韩建业.中华文明的起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 [18]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文物考古与研究(1)[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128-135.
- [19]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五千年前牙雕蚕:对丝绸起源及相关手工业发展研究意义重大[N].郑州日报,2019-04-26(7).
- [20]陈星灿,黄卫东,王明辉,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试掘简报[J].考古,2001(11):3-14.
- [21]李伯谦.青铜器与中国青铜时代[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8:10.
- [22]冯时.万年中国: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3:85.
- [23]马世之.中原之城:河南先秦城址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9:3-13.
- [24]王巍.听首席专家讲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M].上海:东方出版社,2023:41-54.
- [25]王巍.溯源中华文明[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23.
- [26]李学勤.夏史与夏代文明[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160-165.
- [27]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201.
- [28]尚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70.
- [29]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063.
- [3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36.
- [31]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1989(4):1-19.
- [3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344-446.
- [33]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38.
- [3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710-712.
- [35]袁广阔.二里头文化的文字符号与礼制文明[J].中国社会科学,2023(6):100-120.
- [36]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8:1731.

On the Songshan Civilization

Zhao Baoyou Zhang Xinbin

Abstract: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collectively demonstrate that the Songshan Civilization, centered around Mount Song (the Central Sacred Mountain of China's Five Sacred Mountains) within the cosmological "Center of Heaven and Earth", formed a pivotal civilizational framework in the Central Plains core region. Rooted in sacred mountain worship and synergistically integrated with fluvial ecosystems, this civilization represents a prototypical model in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erving as the foundational civilizational matrix encircled by successive ancient capitals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The tripartit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the Songshan Civilization—encompassing its emergence, consolidation, and maturation—exhibits clearly demarcated historical phases, bearing paradigmatic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al progression. Functioning as the vital "floral nucleus" within the petaloid configur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s "multi-petal" structure, it substantially consolidated three essential dimensions: reinforcing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China's unified governance system; establishing the socio-cultural bedrock for the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and forging the fundamental spiritual genealogy and civilizational DNA that characterize Chinese cultural continuity. It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and modern significance to deepen the research on Songshan Civilization in scientifically grasping the historical law of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n enhancing the civilization confidence dur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Songshan Civilization, Central Plains core region, Chinese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何 参 之 昂